

左权战略战术思想探析

——纪念左权牺牲 60 周年

● 魏延秋

摘要:今年是八路军著名将领左权牺牲 60 周年。这位杰出的军事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创立了富有特色的战略战术思想,曾经有力地指导了华北地区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果。他的军事思想,在中国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本文仅就其战略战术思想,做一简要论述,以作纪念。

关键词:左权;抗日战争;战略战术

中图分类号:E296.93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2002)03—0047—55

中国无产阶级军事家左权,是我军抗日战争时期为国捐躯的八路军最高将领。他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队建设、参谋后勤等方面,都有极其辉煌的建树。周恩来称他是“有理论修养同时又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①。朱德称赞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②。左权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经历了十分丰富的战争实践。特别是在抗日时期,他认真总结了实践经验,并不断进行理论概括和升华,形成了内容丰富、见解独到的战略战术思想。探析左权的战略战术思想,挖掘这份珍贵的军事遗产,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扎实的军事理论功底与丰富的作战指挥实践是左权战略战术思想形成的源泉

系统完整的军事理论学习,为左权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军事理论基础。1924 年,左权 19 岁时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在这里,他学习了战术、筑城、兵器、地形、交通等军事基础课目,并接受了比较严格的军事训练。之后,他转入黄埔军校,进一步学习了《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步兵操典》等课程,成绩优秀。1925 年他被选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 年转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在这里左权系统学习了战略思想、战术教程、军事地理、军事筑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等许多课程。除完成规定的课程以外,左权还自修了正规战和游击战战

术、部队建设等军事理论课,并和同学一起探讨拿破仑、苏沃洛夫等人的军事理论。此外,他还努力整理笔记,搜集了大量资料。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习,使左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大大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从1924年至1930年,左权经过了陆军讲武学校、黄埔军校、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等4所院校的系统学习和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军事理论基础,掌握了优良的军事技能,养成了良好的军政素质。1930年回国后左权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闽西分校教育长,并亲自给学生讲课。1931年他在红1方面军总司令部任职时,利用战斗空隙,给干部、战士讲授军事地理课。1932年他任工农红军学校政治军事教官,讲授苏联红军的各种战术。抗日战争中,他在战斗频繁的日子里,仍抽出时间给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第6大队学员讲授步兵战斗条令等课,还给中共北方局党校讲授过军事课。这些经历也使他的军事理论水平得到提高。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他从没有放弃对军事理论的学习,从未停止过对中国这样一个国情下战略战术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在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的过程中,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战略战术方面的成就,实融合了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代、内战时代及苏联红军最进步的战术与敌后五年抗战之战术于一炉,为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创始人之一。他对于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有其永不可灭的功绩。”^③

长期的作战指挥实践为左权战略战术思想的形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军事思想来源于军事实践。左权早在1924年10月在陆军讲武学校学习期间,就随学生队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反革命叛乱作战,初次得到实战锻炼。同年底,该校并入黄埔军校。1925年左权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和第二次东征,后率部参加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军事叛乱。1930年左权先后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在总结红军几次反“围剿”经验的基础上,为指导战争,他翻译了《苏联国内战争的教训》、《苏联国内战争中之红军》、《苏联红军中党的工作规则》等军事著作。特别是在1932年的漳州战役时,他任红15军政治委员,率部首先消灭敌前哨补充营和民团,继又攻占南靖,协助红1军团解放了漳州。此时的他已经开始了军事问题的研究。1934年左权参与并起草了《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批判了当时在战略战术上的“左”的错误,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在长征中,他任红1军团参谋长,参加和参与指挥了红1军团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攻占施秉、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攻取蜡子口等重大作战。随后,他又参与了直罗镇战役指挥,参加了红军的东征、西征作战,并先后担任红1军团代理军团长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等职。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左权将军身先士卒,始终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他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和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协助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八路军部队在华北广大地区,胜利地进行了百团大战及反“扫荡”、反“围攻”、反“蚕食”等重大对日作战,创建并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壮大了八路军队伍。结合对日军作战的实际,他的战略战术思想也日臻完善成熟。他根据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的思想,结合华北敌后抗战实际,先后发表了《论敌人大举围攻晋冀察边区及晋冀察边区反对敌人大举围攻斗争中之经验教训》、《埋伏战术》、《论坚持华北

抗战》、《袭击战术》、《论华北战局形势的特点和坚持华北抗战中作战指导与组织上的几个基本问题》等文,论述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游击战的战术原则。他总结了我军反扫荡经验,写了《坚持华北抗战两周年之八路军》、《“扫荡”与反扫荡的一年》等文,分析了“扫荡”和反扫荡的形势,指明了反扫荡的方针。这些著作作为宣传党的抗战路线,武装华北军民,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日军扫荡频繁,我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左权仍未放弃对战略战术的研究,他的《战术问题》、《开展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斗争》等文,都是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写就的。刘伯承称赞左权“细致核实俱见之于文”。左权是著名的百团大战的主要策划、组织、指挥者。正太战役尚未结束,左权就写了《论“百团大战”的胜利》一文,对百团大战发起的原因、战略意义进行了全面、精当的分析。百团大战后,日军发起了越来越残酷的大“扫荡”,左权依据各师的作战经验和大量情报资料,孜孜不倦地潜心研究日军的“治安强化”和“蚕食政策”,撰写了《论军事思想的原理》等颇有见地和指导意义的军事论著。正如刘伯承、邓小平所评价的:他“善于从经验中抽取与总结出原则的理论,发现规律,指导新的实践。”^④

二、左权战略战术思想的主要内容

左权战略战术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大到关于战略方针的阐明,小到具体战斗方法的运用,他都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的思想中渗透着辩证法精髓,并通过对实践的思考和研究,创立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

1、把战术问题提到加速实现战略目的的高度予以系统研究 最早把战术问题提到加速实现战略目的的理论高度予以系统研究,并取得了突出成就的是左权。在《埋伏战术》、《袭击战术》、《战术问题》等重要著作中,左权从多方面论证了在敌我技术兵器悬殊的条件下,为消释敌人技术、兵器的效力,为保持与发扬我军战斗中的迅速、秘密和突然袭击的特点,以强大的突击力量战胜敌人,埋伏战术是最理想的。左权认为袭击战也是非常重要的战斗措置,它不仅充分发挥我军优势,而且可以尽量减少我在紧迫情况下,在敌人火力下展开兵力与兵器之困难。对此,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对我们的这种战术,“如认为于战局的大势上缺乏重要性而加以疏忽,就会受到意外的损失。”^⑤这就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左权不仅把战术问题直接提到了实施战略意图的高度,而且积极促进了研究战斗规律和指导战斗的《战术学》的形成。无疑,这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特别是其中的战术思想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指示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一场游击战争。但是,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少数人,反对中央制定的这一正确方针,主张以运动战为主,配合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这实际上是要求我军通通统一于国民政府的军队,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身上。因此,在战略方针上,是坚持还是反对人民游击战争,就成了正确或错误的军事路线的分水岭。左权为了从理论上论证和广泛宣传毛泽东这个观点,遂潜心研究游击战争,认真研读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认为战斗方法和战略方针的确定,不能离开当时的战略总目标。他在《论战争指导、军队组织和战术问题》

中指出:“我们确定这一方针之具体条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敌强我弱敌我优劣;敌后特殊与军事任务之性质与本质。在目前阶段中,敌强我弱的形势,仍未获得基本的变化。如敌人兵力、兵器仍优势于我,敌人控制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有利阵地。我被迫分散于偏僻与乡村,就整个战略性质来说,仍是防御性的”。因此,服务于军事斗争之战略战术,是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正是在坚持这一战略方针的基础上,八路军在华北抗战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队伍不断壮大。他指出:“三个年头的华北抗战,一再证明了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之战略方针——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之运动战,无条件的正确。八路军坚持了这个方针,正确的运用了这个方针,保证八路军坚持华北抗战中军事上之伟大胜利。”“共产党八路军坚持的战略方针之正确的道理,是不难说明的。单以在抗战的过去和现在的阶段上,以及将来的一定时期以内,敌我技术条件之不相称,和敌后抗战复杂环境,再加上无后方之作战,一切物质补给的困难等事实,即可明白。”^⑥

2、要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 左权十分重视创立我军的战术。他主张,必须依据我们所处的环境,敌我的条件,我军的历史传统,我军军事任务的性质与本质来进行我们的战术理论建设。1940年他在《论战争指导、军队组织和战术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是工农的军队,革命的军队,是最具创造性的。我们有长期的战争历史,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中国和国际没有现成的适合我军斗争环境的战术,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创立一条正确的马列主义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是件非常大的事情。”他认为,战术问题,虽然是一切战争中的共同问题,但我们的战术,又有我们自己的特殊性。我们的军队和德国、日本的军队不仅军队技术兵器相差很远,国家的性质、军队的本质、军队的军事任务的性质与本质也根本不相同,而且在战术的基本精神上也有根本的差异,所以日本式、德国式的战术我们不能采用。同时,即使是苏联红军的战术,在军队的建设上,在军队的军事任务的性质与本质上,虽有着许多相同点,但如果将其全套战术统统搬来,一成不变,也是不对的。中国一般正规军的所谓正规战术,也同样不可以为我们全套采用。主要的军队与军队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我们今日又是全处在敌后作战环境,而且中国也没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立的战术。他又进一步指出,我们也不能采用纯粹的游击战术,因为我们已有大规模的正规军,游击战术的内容已经不能成为我们正规军战术的全部内容了。通过以上几种情况的剖析,他强调指出,战术理论的建设,“必须依据我们所处的具体环境,敌我的具体条件,我军历史上的传统,我们的军事任务的性质与本质出发规定出来。”^⑦他明确指出:“一切战斗方法的决定,是根据于经济条件、人员的质量和武器,也就是说,依赖于人民的数量与质量和技术。中国抗日战争中战斗方法问题的决定,当然是不能例外的。第一,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工业不甚发展,技术条件远落后于我们的敌人,但有丰富资源,可获战争必需品的供给。第二,中国有众多的人口。中国人民抗日的战争,是抵抗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是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战争,是一种革命的战争。革命的民众与军队是具有最旺盛的坚强的英勇的不顾牺牲与困难斗争的精神的。在敌人方面,则是相反的。第三,中国有多量的军队,但装备不全,训练

不够。敌人兵力不多,装备与训练却都优于我们。第四,中国有广大的领土,但交通不良。我军可以在广大的地域内回旋机动,与敌人作战。敌人是深入我国领土内作战,又以兵力不敷。直至今日止,所占领的地域,仅是交通要道和某些重要城镇,仍是限于点与线的占领。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并以此出发来规定抗战中,中国军队的战斗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事”^⑧。可见在战术研究中,左权有高度的实事求是精神。同时他十分重视批判唯心论和教条主义,努力肃清影响,用正确的战术思想来武装我军指挥员的头脑,指导部队的作战。1942年,他在《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一文中批评说:有人不根据中国今天的实际环境来决定我们的战略战术,而把孙子兵法与曾胡治兵语录,毫不变更地捧出来,有人机械地接受外国军事理论的观点,照搬外国的唯武器论,认为武器决定一切。这种错误思想的根源是机械唯物论。他强调,产生这些错误思想的基本原因,是有些人没有掌握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根据敌我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来规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他还指出,有人甚至受封建社会军事理论的影响,信神兵、宿营时,按八卦摆好方位,看风水,选择“吉利”的地方住下等。这些错误思想的根源,是唯心论。他十分严肃地指出,如果这种错误思想不克服,就难免产生错误的战略战术,给抗日战争走向胜利以更大的困难,而且在将来的共和国军事思想建设上,都会发生严重的危害。他在40多年前论及的这些问题,至今仍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3、知己知彼,创立克敌制胜的战术 在作战中,如何发现敌人的长处和弱点,以及如何发扬自己的优点,正视和克服自己的弱点,亦即做到知己知彼,这是关系作战成败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左权根据战争实践,提出了许多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侦察敌情,发现和创造敌人的弱点。左权指出,敌人虽然有不少优点,然而也有许多弱点,这就是要善于发现敌人的弱点,抓住敌人的弱点,要善于逐渐削弱敌人的有利条件,从而扩大它的弱点。左权强调要采取各种手段搜集敌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材料,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才能真正掌握敌情。他指出,“要经常地把眼睛看着敌人,了解敌人,不松懈,不疏忽,不麻痹,不受敌人突然的危害与损失。”^⑨1941年5月2日,左权以个人名义向八路军各部队发出了《关于搜集敌军政治文化等建设材料的通知》,要求收集有关敌人在华北地区的各种材料,并要求有具体的数字和生动的事例。同时,他还把缴获的敌人文件、刊物以及通过其他方法得来的敌伪材料,翻译出来,整理印发八路军各部队,以便参考。左权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对这些材料认真加以研究,同时结合我军战时的经验教训,从分析敌我双方的基本态度中,探索规律,确定对策。他还亲自参与组建了八路军司令部情报处,来加强八路军的情报工作。他认为要通过了解敌人,发现敌人的弱点;要善于削弱敌人有利条件,抓住敌人的弱点,进而扩大敌人的弱点;要利用各种方法,去创造敌人的弱点。他认为,只有在敌人的弱点暴露之后,才能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进行有把握的作战,夺取战斗的胜利。左权的要善于“创造敌人的弱点”的战术思想,要求我们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谋略,想法设法,去调动敌人,使敌人犯错误,使敌人的计划、布置和行动出问题,出纰漏,迫使敌人就犯。左权指出,在发现敌人的

弱点后,就必须进行速决的进攻。因为,只有速决才能各个击破敌人,才能连续作战,才能使敌优点不能发扬。因为,“只有进攻才能消灭敌人,才能创造敌人之弱点与抓住敌人之弱点,才能避免自己的弱点,发扬自己的优点,取得战争的胜利”。^⑩也就是说,只有速决的进攻,才能进行大规模的趋利避害的机动。

二是要善于发扬自己的优点,善于消灭自己的弱点。左权认为,在作战过程中,如果不善于消灭自己的弱点,使自己的弱点暴露在敌人面前,就正好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作战就难免要遭受损失,甚至于吃败仗。那么,怎样消灭自己的弱点呢?他主张,在战役战术范围来说,就必须在战斗行动中做到以下三点:一是一切战役战斗的组织,应该有详尽的考虑,周密的计划,不出于粗暴与轻率,特别是不就敌人的范,不受敌人的欺骗;二是要加强自己的战斗保证,要严密自己的侦察警戒,保持紧张的战斗准备,使敌人没有可乘之机;三是加强指挥上的保证,依据情况定下正确的判断与决心,保持对部队的不断指挥,贯彻自己的决心,局部行动要服从总的行动,反对游击习气。左权提出的要善于创造敌人的弱点和消灭自己的弱点的思想,是毛泽东发挥战争中主观能动性思想的发展和深化,是将军事辩证法运用于军事理论研究,指导作战的一个典范。

4、明确提出 15 条战术原则,并指出在运用这些战术时所存在的不良现象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左权就撰写了《论目前敌人的动态和我军采用的战术》一文,详尽地分析了日本侵略军在巩固后方交通线所采用的各种手段,以及敌人在战术方面的弱点和缺点。最后,对我军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详细阐述,明确提出了 15 条战术原则,主要包括:广泛开展民众抗日斗争、自卫斗争,发展游击运动;游击队和基干部队应利用一切优越条件,寻找自己的主动地位;在一切活动过程中,游击队与基干部队应有密切的联系和相互的补助;当敌脱离联络线进入山地向我进攻的时候,应成为消灭敌人的良机;当敌人分途进扰时,要严格注意各支队之间距离间隔及其相互联系;一切战斗的发起,主要的应带着高度的突然袭击的性质,预先在可能来敌的方向设伏;无论大小战斗,都不能当作儿戏;基干部队及游击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有灵巧的动作,不要长久地驻扎一地,遭敌的袭击、合击,不应拘于一种战斗方法;当投入战斗的时候,第一线的部队应保持有强大的兵力与优势的火力,以便能连续向敌冲锋,不要逐渐地增加兵力,而遭敌人的各个击破;对于敌人联络线上守备之敌,应施行不断的袭扰,增加其恐怖;我沿线各个部队在其一切斗争过程中,应有很多的配合与协同,应保持良善的通讯联络;加强对敌人技术兵种的防卫;在敌人之联络线上,在其驻地之近旁及一切可能来敌的方向,满布我之游击部队及分派优良的射手,潜伏其近旁,见到敌人就打,有机可乘时,就给以袭击,使敌无时无刻不在我包围中、袭扰中,使敌时刻有被我射杀的危险,这样不断地消耗敌人;加强我军的侦察;严密抗日戒严。这些原则虽然提出于抗日战争开始的短期内,但对日军的作战特点及我军应采取的战术原则和具体手段的研究却是非常深入和切合实际的。可以说这些战术的提出和运用,为八路军挺进华北、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八路围攻”,创建晋冀豫根据地,都起了良好的指导作用。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左权注意到在运用这些战术原则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现象,主要是:消灭敌人的信心与决心不够,战斗的顽强性、积极性不够;对于战术基本精神的把握很差,受了不必要的损失;警觉性不够,轻视敌人,不注意保护自己的部队;技术知识和掌握技术的能力薄弱;领导民众、组织与指挥民众参战的艺术不够;游击主义习气存在。这些不良现象是左权深入调查与思考得出的,充分体现了左权踏实、严谨、务实的作风和与时俱进的理论研究品格。

5、几种适合当时情况的战术方法 左权对游击战争战术基本方法和内容的研究也是独具匠心的。他把它概括为各种方式的袭击,即对运动的敌人,主要是应用埋伏;对驻地的敌人,主要是应用袭击与急袭。他说:“一般的说来,袭击、急袭、伏击三者,统属于袭击范围,而此三者之中,以伏击最为容易取得胜利。它是先敌展开自己兵力与兵器,于已选定的隐蔽地区中,突然向正在运动中的敌人发起的战斗。这一‘法宝’不仅是小的游击队爱经常‘玩弄’它,在抗日战争中,在敌我技术兵器不相称的条件下,为消灭敌技术兵器的效力,为保持与发扬我军战斗中的迅速秘密和高度的突然性,坚决而强大的突击以战胜敌人,就是正规军在运动战中也力求采用这样的战术。同时,在另一方面,因为它是先敌展开自己的兵力与兵器于选定的隐蔽地区中,又减少了我军在紧迫情况中,在敌人火力下展开兵力与兵器之困难。这特别对于我战术素养较弱之军事指挥者,不仅给了多方面的方便,而简直是非常重要的战斗措置。”^⑪

在抗日战争中,敌人施行了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键,以据点为锁,企图将我各个根据地孤立起来的“囚笼政策”。左权将军还专门研究与总结了交通战的经验。他认为,交通战是敌我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在各个领域,猛烈地同敌人进行交通战,争取我在战略战术之一切优势。只有如此,才能粉碎敌人由点线扩张为面的战术企图。他还把同敌人开展交通战的方法概括为“破击战”。他提出,一方面,要动员全体民众,配合军队进行“有计划的,自主的,向敌之主要交通线、交通之‘动脉管’上,如铁路等,作大规模的破击,彻底毁坏”;另一方面,在破击战中的战术方法,主要是采取袭击、急袭的方式,以爆破手段为主和强有力的火气攻击。要以高度的准确性,破击敌人的一切交通设施,以达到彻底打败敌对我“囚笼封锁”的目的。

6、灵活用兵,机动作战以突击敌人、消灭敌人 左权十分强调机动作战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机动作战,在军事科学系统上无论是以往和现在,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主张各级指挥员在自己的机动计划中,应具有旺盛的、不断歼灭敌人的企图。在战斗前、战斗中、战斗以后的一切兵力转移,“都应时刻保持自己的机动地位,而灵敏地查明与回答敌人的动机,不被吸引,不屈从于敌人企图,进行己所不愿的战斗。”^⑫

左权在总结抗战八月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战术上的真理之一就是灵敏的统一指挥,恰当的协同动作,能发挥部队的战斗力,战胜敌人,呆板笨拙的指挥和各自为战,互不相关的战斗,往往失败,并影响战局。这里,左权强调了灵活机动作战的重大意义。左权认为,要实现战斗中的机动,就必须进行机动灵活的部署,找准时机打

击敌人。这就要求：寻求敌人的弱点，集结最优势的兵力，突击敌人的弱点；迅速和秘密地接近敌人，迅速发现敌人；以包围迂回的手段，压迫敌人于不利的战术地位；坚决迅速地投入白刃扑搏；条件不利于我战斗时应退出战斗，转移兵力。

他要求在灵活用兵组织战斗时，善于大踏步地进退，善于分散与集中，善于融合组织各种力量到战斗里面来，反对一切隔岸观火，企图苟安一时，或各自为战的现象的出现。同时要灵活运用战术。左权还认为，在作战中，要灵活地运用战术，发挥我军机动、敏捷、迅速、勇敢的特长，旺盛的攻击精神和艰苦卓绝的传统，打破敌人的目的和企图。他提倡运动战，这样可以消耗或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我军的消耗也会很少，容易取得战斗的胜利。而单纯的防御战、阵地战，就会给敌人发挥一切技术兵器优势的机会，使我军遭受最大的消耗与损失。他指出：“我们战术的基本精神，就是以最积极、最灵活、最神速、最坚决与最秘密的动作，向敌人进攻。……我们的战术是最灵活、最有丰富内容，最能适合敌后开展大规模民众性游击战与运动战之战术。”^⑬

三、左权战略战术思想的特点及意义

左权的战略战术思想内容丰富，在战略战术方面阐明了许多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思想内涵。

左权战略战术思想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的光彩。把战争建立在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基点上，是左权战略战术思想的出发点，也是他全部军事理论的根本指导思想。他的每一个战略战术原则中都渗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都体现了人民群众是战争力量的源泉这一颠扑不灭的真理。他在《论坚持华北抗战》中说：“华北有一万万人民，他们都是不愿做亡国奴的黄帝子孙，他们不甘心做敌人的奴隶，他们不能忍受在敌人铁蹄下的牛马生活，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和热烈的民族感情。”这一万万民众在共产党领导下与各党派结成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胜利的坦途，就将到来。”他提出要重视民众的物质生活，批评鼓吹精神战胜一切的主观唯心主义，“只给民众以精神上空洞的安慰、鼓励，而要求人民做一切，却不回答人民所要求的一切，必然会减弱战争的群众性，必然会产生错误的战略战术。”^⑭在1940年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的时候，左权提出要发动群众，开展各种斗争，巩固抗日根据地。他指出要反对敌人的“蚕食”政策，“我们必须把我们各种力量、各种组织、各种斗争形式有机地配合起来，发挥全面斗争的力量。”，“我们有更多的优越条件，我们所举行的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我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各个根据地内有广大的群众组织，有公开的合法的抗日民主政权，有长期的工作经验与工作基础。”^⑮他在《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中分析为什么八路军能在敌后方坚持，能不断战胜敌人，能取得伟大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八路军能团结民众，能取得民众的爱戴、拥护和帮助。他的灵活机动的战术思想，他的袭击战术、埋伏战术的使用，都是以发动人民群众为前提，都是建立在人民的帮助和支持，才能运用的基础上的。

左权的战略战术思想渗透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精髓，体现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风格。左权非常重视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战术，主张用辩证的观点来创造

新的战术,认识新战术。他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用辩证的眼光来认识一切战略战术,而且我们从实际的斗争中用辩证的方法来创造新的战略战术。”^⑥他说:“在抗战战略性质上,说是持久的防御的,在执行这个战略的战役战术就必须是速决的进攻的。这一点也不矛盾,而恰恰是辩证的一致的。这正是劣势装备的军队抗击优势装备的侵略的敌军的正确的指导原则,这就体现了战略与战术的辩证统一。”^⑦他还指出,任何一个战术原则都有它的两个方面,都是对立统一、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的。比如防御战与进攻战的本身过程,就实现了防御与进攻的统一性。防御是以积极行动进行的,本身包含反冲锋,进而变为进攻的性能;而进攻战的本身,则有可能变为在相当的阵地上做防御甚至退却。左权主张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正体现了防御与进攻的辩证关系。至于在什么情况下防御或者进攻,全取决于我们一定要把行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军队的主动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丧失了主动,就是丧失了行动的自由权。”^⑧主动与被动,固然是以力量为基础决定的,但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方并未从根本上丧失主动的地位。敌强我弱,这是敌人的优势;但我们有许多有利条件,敌人又有许多不利条件,这又是我们的优势。要使我们能够获得主动权,就必须依靠每个指战员,在每一个具体的斗争环境中,善于发现与正确运用这些有利条件,正确处理好各种矛盾,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做到未战之前,“先处战地而待敌”,既战之后,“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左权把这类战略战术原则和方法称为“辩证法在实际战争中的应用”^⑨。

左权在抗日战争开始的短期内,对日军的作战特点和我军应采取的战术原则与具体手段等进行了深刻的研究,留下了大量的军事文选,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块丰碑。

注释:

- ① 周恩来:《左权同志精神不死》,《新华日报》,1942年6月21日。
- ② 朱德:《悼左权同志》,《解放日报》,1942年6月15日。
- ③ 《左权烈士略传》,载于《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0日。
- ④ 刘伯承、邓小平:《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新华日报》华北版,1942年7月7日。
- ⑤⑥ 左权:《袭击战术》,1940年7月。
- ⑦⑧⑩⑪⑫左权:《战术问题》,1941年2月。
- ⑧⑫左权:《在东路军高级将领会议上的发言》,1938年3月。
- ⑩左权:《论战争指导,军队组织和战术问题》,1940年5月。
- ⑭⑮⑯左权:《论军事思想的原理》,1942年6月30日。
- ⑮左权:《开展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斗争》,1942年5月10日。